

## 序 章

“大东亚战争”开始前,尤其是在1937年“日华事变”开始以后,关于马来亚华侨的政治活动,人们从华侨与祖国中国的关系、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等侧面进行了分析,但关于“大东亚战争”中马来亚处于日本占领下的时期,却认为马来亚华侨的抗日战争完全是为了保卫马来亚的战斗,并在没有论及与中国的关系的情况下,便认为华侨的马来亚归属意识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确立。

本书从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反映了历史这一疑问开始写起,探讨马来亚华侨的马来亚归属意识实际上是什么时候、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而确立起来的。以往华侨是具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靠中国归属意识支撑着。在研究的第一阶段,将对与马来亚归属意识呈相反关系的、华侨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情况及其变化进行分析,在第二阶段,将探讨马来亚归属意识何时、在何种状况下形成并确立起来。

中国与华侨的联系是由华侨的中国归属意识的强弱,以参与中国国内政治为目的的人物(尤其是领导人)、组织、活动的存在,中国政府对华侨问题的参与这3种要素组成的。本书拟分别对这3点加以论述。

“中国”就国家来看,指1949年9月以前的中华民国和同年10月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政治势力来看,已在20世纪20年代分为中国共产党(中共)派和中国国民党派,两派为了获得更多的华侨的支持进行了激烈的交锋。

国民党派除了国民党支部之外,还把中华总商会等拉入自己的势力,但运动参加者仅限于实业家等上层华侨,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与此相反,中共派在教师、学生、工人、小商人、店员、摊贩等之间逐渐

扩大支持者,尤其在1930年马来亚共产党(马共)成立之后,通过马共扩大了影响力。因为无论是马共,还是其前身南洋共产党(1928年成立),成立时的最高干部大部分是中共派遣的中共党员。马共通过对马来人的渗透等致力于组织、路线、运动的马来亚化,但因受阻于英国殖民地当局的镇压等种种障碍,实际上将马来亚化束之高阁,30年代后半期以后便主要集中于支援中国的救国运动。这一时期,日本加快了统治中国的步伐,因此华侨当中也出现了抗日运动,对中国的爱国心高涨。马共转而采取了重视中国的路线,并产生了效果,成为了抗日运动的主角,其后也主导了日本占领时期的抗日斗争、战后初期的合法的政治活动、1948年6月以后的武装斗争。中共派的势力远远超过了国民党派的势力。而且国民党政权于1949年逃往台湾以后,便失去了本身是侨乡(福建、广东等)的统治者这样一种取得华侨支持的最大因素。也就是说,左派——中共派各组织在国民党派借当地政府之手加以镇压、解散之前,体现或代言了广大华侨的认识。因此将左派——中共派组织到底开展了什么运动作为中国认同意识、中国归属意识的中心加以分析。

本书分为两部。第一部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时的情况,第二部将论述战后的情况。

## 一. 战前、战时的华侨

第一部着重分析日本占领时期的华侨的政治活动和意识形态,同时探讨这些活动和形态在第二次大战前是如何形成的。

关于战前的情况,南洋共产党及马共领导人都是些什么人物?与中国、中共有着什么样的关系?马共为了该党的党员、路线的马来亚化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为什么马来亚化没有进展,却确立了重视中国(抗日救国)的路线?进入日本占领期后,在压迫华侨、分裂种族措施下华侨所处的状况、马共及其属下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以下简称“抗日军”)的抗日斗争实况、与战前抗日运动的关系、这些情况和斗争

对华侨大众所产生的影响、或意识变化、尤其是他们意识中的中国与马来亚的定位的变化、与马来人的关系等都将成为分析的重点。这里最大的要点是，日军占领是否带来了华侨的中国归属意识的消除和马来亚归属意识的确立？如果带来了，那么是以什么形态、在什么意义上带来的？关于战后抗日军为何按照与英军的协议解除了武装，以往没有结合马共党员或抗日军队员的归属意识进行过论述，这一点也想重新探讨一下。

关于战前、尤其是成立初期的马共与中国的关系，根据取缔方（英国、日本）资料所进行的研究难以取得进展，直到这几年才找到当事人方面的资料和信息，本书将通过对这些资料和信息加以分析，探讨马共及左派华侨与中国关系的真实情况。

第二部从下面这些观点探讨战后华侨意识的变化和马来亚归属意识的确立过程。

## 二. 战后的马来亚华侨

对有关马来亚抗日战争的大量资料<sup>①</sup>进行过整理的蔡史君（Chua Ser Koon）在另一本书中对日本占领时期的意义进行了如下概括：

（日本统治下的）3年半的苦难日子提高了华人的国家意识。他们深深体会到必须摒弃以往一直持有的移民思想，关心侨居地的政治经济，必须与其他民族同心协力建设自主独立的国家，使自己不再受到侵略、掠夺。日军3年半的暴政无疑为马来亚的华人和其他民族提供了反面教材。不能不说战后华人积极参加取得公民权等的政治活动是因为日军的南侵及占领期的悲惨经验造成了重大的刺激<sup>②</sup>。

如后文所述，战后初期华侨参与马来亚政治很难说是积极的。尽管人们对日本占领期间做了详尽的实证分析，但不能不说其总结本身

① 许云樵（原编者）、蔡史君（编辑）：《新马华人抗日史料 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1984年。

② 蔡史君“战时马来亚的华人”，林水楼、骆静山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会，1984年，第87页。

并没有得到确凿证据的证明。

关于战后的情况,现实中华侨与中国的关系依然根深蒂固,一部分反而有了进一步的加深,但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对中国与华侨的具体关系及其变化加以探索的研究。在把抗日战争作为分水岭的看法成为大前提的基础上,对华侨经济力量的分析和对参与马来亚独立运动的分析成为了极大的主流,因此与中国的关系受到了轻视。这样,有关战前的研究与有关战时、战后的研究之间出现了很大的间断。

以下就这一点进行稍微详细的探讨。应该说是马来亚华人政治的最高基本文献的王庚武(Wang Gungwu)教授的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做了如下论述。

首先,王教授就战后的马来西亚华人做了如下3种分类。这3种分类是王教授首创的,现在作为分析马来西亚华人的最有效的方法仍然受到广泛使用。

A组:保持与中国政治的关系,经常将自己与中国的命运联系起来考虑。

B组:由实惠的、现实的大多数华人组成,关心同业组织、同乡组织的不显眼的间接的政治,但极少顾及政治理想或长期目标等。

C组:对马来亚(马来西亚)具有某种形式的忠诚之心。<sup>①</sup>

设定了这种标准的王教授就战后至马来亚独立期间(1956-1957年)的特色做了如下设想:

马来亚华侨……对同盟国取得胜利、中国成为大国之一感到很高兴。……B组渴望强国中国哪怕是间接地给他们带来利益。A组重新狂热地参与中国政治,有的人为了参加中国的基础建设而回去了。  
……

他们参考了新的要素。主要是A组华侨掌握主导权的马来亚共产党(马共)的势力、组织能力。……

必须探讨3类华人的重组。首先,A组分化为国民党派、软弱的

<sup>①</sup> Wang Gungwu,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China Quarterly, No. 43, Tul. - Sep, 1970, pp. 4 - 5.

反国民党系统的民主党派、共产党派，共产党派积极地支援了其马来亚版的马共。……分化与马来亚当地的状况毫无关系，主要与中国的重新统一相关。……马共领导人（战时 C 组华侨也参与了）试图结合马来亚当地的国情制定政治目标，但整体华人社会并不认为（马来亚的问题）是核心目标，在如何涉及中国的共产主义这一更大的目标上，时而支持马共，时而拒绝马共<sup>①</sup>。（下划线系引用者所划，下同）

王教授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所在。笔者认为该论文就当时的情况做了客观的评价和极其尖锐的指出，战后不久马来亚华人的中国认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涨，马共与中国政治保持着关系，以解放马来亚为目的的马共本身也是以认同于中国的领导人为主体的。该论文在提示了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概述了 19 世纪以来的马来亚华人的政治意识、政治运动，但并没有以具体论述各时代的意识、运动为目的。因此，当然没有言及这个时代的强烈的中国认同以什么样的运动体现出来？以 A 组为基础的马共的运动带有什么样的特性？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等等。这一方面的分析必须期待其他研究著作。但是，不管是否受到这篇优秀论文的启发，可以说基本上还没有能够满足这一要求的研究。以下概述一下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

在对战后马来亚华侨的政治意识、政治运动进行分析的大量的研究著作中，明确表示马来亚华侨与中国认同无关的著作的确很少。奥巴兰斯的著作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本，他论述了马来亚华侨战后不久的“新精神：对抗日军的功绩所感到的自豪和参与将来的国家建设的决心”，并论述道：

许多华侨的认同和热情突然从以前的母国转换到今后仍继续居住的马来亚。<sup>②</sup>

人们的认同转换大概不能以“突然”一词就可以简单地说明的。

1945 年 10 月，英国提出了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计划，但因

① 同上，第 17、18 页。

② O' Balance, Edgar, *Malaya: The Communist Insurgent War, 1948 - 1960*, London, Faber & Faber, 1966, pp. 66.

遭到马来人保守阶层的反对,该计划被葬送了,而大幅度限制非马来人居民取得公民权条件的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则成立了(1948年2月)。许多研究人员指出,在此过程中,尽管是围绕公民权这一最基本问题的斗争,但华侨的反应却很迟钝,倒不如说是毫不关心(马来人开展了强烈的反马来亚联邦运动)。例如,研究马来亚华侨的先驱维克托·帕塞尔做了如下记述:

结果,华侨并不关心马来亚联邦。……华文报纸充斥着有关中国的报道,但(对马来亚联邦)仍然仅表示一点点关心<sup>①</sup>。

同样的看法还有很多<sup>②</sup>。1952年通过修改法律放宽了取得公民权的条件,这是为了将华侨的关心从中国转向马来亚。这一主张<sup>③</sup>的着眼点也是一样的。也有人指出,在马来亚不是独立国家、不知公民权带有何种权利的阶段,华侨保持中国国籍是理所当然的<sup>④</sup>。既有人认为不关心马来亚反映了华侨深深地关心中国<sup>⑤</sup>,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的忠诚之心<sup>⑥</sup>;也有人认为也许是因为非马来人竭尽全力重建个人生活<sup>⑦</sup>。但是,这些分析也没有触及对中国的关心以什么样的形态体现出来,具有什么样的政治意义。

① Purcell, Victor, *The Chinese in Malay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286 - 287.

② 例如,Turnbull, C. M., *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 - 1975*,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29, 232; Ratnam, K. J., *Communalism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Malaya*,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5, pp. 149 - 152. 谢诗坚《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檳榔嶼, Yunita Enterprise, 1984年,第88页;等等。

③ 例如,Turnbull, C. M., *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 - 1975*,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29, 232; Ratnam, K. J., *Communalism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Malaya*,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5, pp. 149 - 152. 谢诗坚《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檳榔嶼, Yunita Enterprise, 1984年,第88页;等等。

④ Yeo Kim Wah,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1945 - 1955*,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19, 229, 242, 258, 280; Mohamed Noordin Sopiee, *From Malayan Union to Singapore Separation*, Kuala Lumpur, Penerbit University Malaya, 1974, pp. 33.

⑤ 谢诗坚,前揭书,第33页;Stubbs, Richard, *Hearts and Minds in Guerrilla Warfare: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 - 1960*,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3; 等等。

⑥ Yeo Kim Wah, 前揭书,第125,144页;Short, Anthony, *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1948 - 1960*, London, Frederic Muller, 1975, pp. 254, 257, 269.

反过来也有明确地否定认同中国之说。参照 Stenson, Michael R., *Repression and Revolt: the Origins of the 1948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Ohio University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69, pp. 27. 仅就这一点来看,可以说 Stenson 的观点与注④相同。

⑦ Mohamed N Sopiee, 前揭书,第38,49页;Lau, Albert, *The Malayan Union Controversy 1942 - 1948*,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27 也有表明了同样的看法。

### 三. 中共派华侨的动向

研究马共的第一人谢文庆(Cheah Boon Kheng)教授就马共的中国观做了如下叙述:

华侨把(主持了1945年10月10日双十节的)马共、抗日军看作向中国表示忠诚的华侨组织、中国人爱国者,马共、抗日军本身也是这么认为的<sup>①</sup>;马共仅在1937年至1945年期间倾向于中国民族主义,这是由于抗日运动引起的<sup>②</sup>。

谢教授认为马共出现中国认同仅是在1937-1941年期间,关于战后,他并没有提出自己的判断,只说“马共仅在1945年出现中国认同”。

也有人主张不论马共本身的性质如何,为了扩大组织,马共只是利用了普通华侨的中国认同<sup>③</sup>。这样的话,就不知道马共对中国与自己的关系如何定位了。

对战后马来亚劳工运动进行了研究的冈巴认为共产党派的中国认同应是更为长期的,并做了如下论述:

华侨的“爱国心”和共产主义在华侨的共产主义支持者身上似乎混合在一起,时而有互换性<sup>④</sup>。

关于在马共领导下的劳工运动,最近有人做了如下意味深长的指出:

总工会(General Labour Unions)[马共影响下的工会全国组织,正确的是G. L. Union。1947年2月改称为“职工联合总会”(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笔者]致力于动员印度人工人,却完全无意争取

① Cheah Boon Kheng, *Red Star over Malaya: Resistance and Social Conflict during and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1-1946*,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52.

② Cheah Boon Kheng, *The Masked Comrades: A Study of the Communist United Front in Malaya 1945-1948*, Singapore, Times Book International, 1979, p. 58.

③ Stubbs, 前揭书,第50页。

④ Gomba, Charles, *The Origins of Trade Unionism in Malaya: A Study in Colonial Labour Unrest*,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372, 373.

华侨工人。……总工会无意解决华侨工人的问题，……但却对与在物资不足、低工资这种战后的混乱中挣扎的劳工几无关系的中国政治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心<sup>①</sup>。

但遗憾的是，该论文的作者并没有进一步论及马共与中共的关系，也没有说明马共、总工会、职工联合总会如何参与了中国的政治？具体地举行了什么活动？

如上所述，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马来亚独立（1957年）期间的马来亚华侨，以往的研究虽然言及了一般华侨或马共等的中国认同，但均停留在表面。因此，究竟进行过何种有关中国的运动？到底扩大到多大规模？有什么变化？华人的中国认同什么时候、由于什么缘故、又是如何转换为马来亚认同的？这些观点一概没有。填补这一空白就是本书最大的目的。

#### 四. 整个华侨社会的动向

在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10 余年期间的华侨的政治认同和归属意识时，仅对左派、中共派加以分析是不能归纳一般华侨的政治认同和归属意识的。这主要出自 3 个原因。

第一，战后马来亚的左派、中共派组织在殖民地政府当局的镇压下成为了非法组织，至少不能进行公开的活动，但这些组织的活动的停止、潜伏或消亡未必与以往支持者脱离中国、转向马来亚认同的意义相同，因为前者与后者之间在时间上存在着相当大的不一致。

有关成为非法组织后的左派、中共派的意见和活动的记录基本上没有找到，探讨剩下的参加者、支持者在组织解散后实现了什么样的认识转变是很困难的。因为，关于马共等核心组织，从该党机关报《南侨日报》等可以把握其认识和运动，但《民声报》于 1948 年 6 月、《南侨

---

<sup>①</sup> Leong Yee Fong, 'The Emergence and Demise of the Chinese Labour Movement in Colonial Malaya, 1930 - 1960', 1933, p. 22 (Unpublished article).

日报》于1950年9月被禁止发行以后,不仅是马共等继续进行非法活动的极少数组织的动静,关于一时避免非法化的左派、中共派组织(剩下几个群众组织和统一阵线组织)的动静,说起来已经没有了以当事人的身份传达这些动静的机构。中国归属意识、中国认同意识的强烈及变化只有从不同于这些组织的角度来考察。

关于这些组织,尽可能考察了它们持续存在到什么时候,但能够考察的数量极少,而且即使仅仅弄清存在到什么时候,也不能把握其规模、性质及参加者的意识形态,因此从这一角度的分析自然有其界限。

关于脱离中共派、加强马来亚认同的人们的言行,有一定程度的记录,可以弄清其部分历程,因此本书试从这种观点进行分析。

第二,在并非政治结社,只是互助、和睦团体的组织当中存在着许多亲中共派,其中有几个左派、中共派组织在成为非法组织后也避免了解散(如新加坡福建会馆)。这些组织在左派组织非法化后不久成为了亲中共活动的核心,但由于殖民地当局的压迫政策和反中共政策,不久便迅速地脱离中共,加强了马来亚认同。也有必要探讨这些组织与亲中派组织的关系和脱离中国的状态。

第三,因为超越中共派、国民党派这一对抗意识的中国人意识、即从感情上的中国认同、中国归属意识也根深蒂固地残存于国共两派支持者及围绕两派支持者的华侨大众之中。这种意识最明显地出现于对中国总领事馆及领事馆的理解方式,他们在华侨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便认为(总)领事馆当然应该对此加以保护,实际上也请求(总)领事馆采取直接保护措施或与当地政府交涉。

考察一般华侨群众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华文报纸的论调。中共系统的华文报纸被殖民地当局禁止发行,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20世纪50年代初期许多国民党系统的华文报纸和中立的华文报纸逐渐表明了倾向中国的姿态(这吸引了更多的读者),不久进一步转为了以马来亚为中心的姿态。

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的集会遭到禁止后,在

10月10日国民政府“国庆节”(双十节)的庆祝方式中也似乎反映了超越党派的感情上的中国归属意识。不能庆祝10月1日的人们与公然主张支持蒋介石政权的上层华侨不同,他们在底层支持了各地的双十节集会。但是,由于华侨本身的马来亚归属意识的进展和加强、顽固的国民党政府支持派脱离华侨大众等,双十节集会也逐渐缩小了规模,不久便消亡了。

因此,考察华侨对(总)领事馆如何定位、华文报纸对中国和马来亚的姿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国庆节和双十节集会到什么时候、如何展开,对分析左派、中共派组织解散后华侨大众的中国认同意识的变化应该是剩余的最有效的观点。

此外,本书中所用的“中国归属意识”、“中国认同”的表现均指将中国看作自己的祖国、将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引为自豪、认为以某种形式参加中国国内政治是自己的职责这一意识。自己是否要回到中国、或是否已经回到中国并不是问题。与其相对的是“马来亚归属意识”、“马来亚认同”,指将马来亚作为祖国、参加马来亚的政治、在马来亚谋求作为国民的合法权利这样一种意识。从前者到后者的意识转变过程就是本书最重要的主题。

基于以上这种观点,将本书分为两部——第一部“战前、战时”和第二部“战后”,并分为下列各章。

在第一部第一章中,关于归属意识的变化,将从马共历史的观点论述日本占领的意义,第二章将集中考察日本占领期对马共和整体华侨社会的影响。

在“大东亚战争”中,沙巴(以前的英属北婆罗洲)也发生了抗日游击队叛乱事件。马来亚抗日军的大部分参加者是华侨,而沙巴游击队的参加者则有许多原住民,两者在性质上有相当大的不同,但由华侨主导、主要领导人都是华侨、继承了战前的抗日运动这几点却是相同的。对日本占领下的沙巴的华侨和游击队来说,沙巴和中国被如何定位?由华侨本身做出的评价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将在F考察。

第二部的第四——六章主要就左派、亲中国派各组织的动向,第七——十章就全体华侨的动向加以考证,第十一章将考察作为中国与马来亚直接桥梁的“人们”的动向。

在第四章中,将着眼于被认为经过抗日战争而完全马来亚化的马共实际上直至武装斗争开始(1948年6月)前的和平斗争路线时期始终将中国写为“祖国”这一点,并提出马来亚化与武装斗争已表里一致的假设。第五章将探讨战后中共派华侨对中国和马来亚如何定位、与马来亚派华侨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争论?第六章将考察中共派组织中有什么样的组织、这些组织如何获得了华侨的广泛支持、与马共有着什么样的关系?第七章将分析有过什么样的支持中国运动、什么样的组织参加了国庆节等中国派的集会、集会及相关组织的消亡或变化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第八章将着重从年号写法、停刊期间的脱离中国、“祖国”及“我国”等称呼从中国转换为马来亚等来探讨华文报纸姿态的马来亚化。第九章将论述新加坡、吉隆坡等马来亚各地的中国(总)领事馆难以满足华侨社会的期望,无法充分保护其权利,结果促进了华侨脱离中国的情况,以及保护华侨的角色一时由扎根于马来亚的政治组织(右派政党)承担的情况。第十章从国民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法等来考证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至50年代前半期国民党政权和人民共和国政权试图加强对华侨的影响,但马来亚“当地”的华侨政策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很大作用的情况。第十一章通过对强制遣送回国或自愿回到中国的马来亚华侨加以分析,探讨在华侨与中国密切联系的时期,对华侨来说,中国意味着什么?对中国来说,华侨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此外,作为参考资料,将附上表明中国与马共关系的、笔者与马共干部的面谈记录。另外,书末收录了重要的相关年表、有关中国的集会一览表及回到中国的人员名单。

另外,华侨名字的读法尽可能标上马来亚当地的发音。只要没有特别说明,引用文中的下划线部分均是引用者(笔者)为了加以强调所划上的。

# 第一部 战前、战时的马来亚 华侨与中国

## 第一章 马来亚共产党与抗日战争

——“祖国救援”、“马来亚民族解放”的交错

### 前 言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成为马来亚唯一的政治、军事势力的马共及其军事组织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向回到马来亚的英国殖民地当局交出了武器、自己放弃了实现“马来亚共和国”的原因，以往人们列举了马共总书记莱特是英国当局的爪牙、莱特强制推行了错误的和平主义路线等情况（将在第二节（一）中详述）。但是，马共为什么这时接受了莱特的放弃武装斗争的提议？换言之，同意放弃武装斗争的土壤以何种形式存在于全体马共党员中？关于这些问题没有任何论述。也就是说，以往人们仅阐明抗日战争结束时马共转换路线的偶然性，却忽略了其必然性。

对马共来说，马来亚的抗日战争是为了支援中国的抗日、解放斗争——为救援祖国的斗争，作为马来亚解放斗争的意义是微弱的；为此没有认识到在抗日战争后接着进行“为解放马来亚的抗英武装斗争”的必要性。这才是导致解除武装的必然原因。这些是笔者在翻阅各种文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假设。

为了马来亚的全民族解放而组成的马共(1928年南洋共产党、1930年马来亚共产党)在当初整体组织陷入瘫痪后,正值日本侵略中国引起华侨之间掀起抗日救国(“国”指中国)运动,在这种形势下,作为华侨的抗日组织的前卫扩大了势力。关于这一动向,人们做了这样一些评价:“马共充分利用了日本侵略中国所引致的华侨之间所产生的对中国的同情”<sup>①</sup>、“马来亚的共产运动……并非纯粹的共产运动,而是借用抗日反法西斯运动之名,实际上继续进行了共产运动”<sup>②</sup>,即主张“利用”论、“伪装”论。但是,具有一定方向的组织上的急速膨胀往往会给组织本身的性质、路线带来很大的变化。如果领导人确信该方向是正确的,就更是如此。马共是否也通过利用救国运动,转换为特殊民族主义色彩极为浓厚的组织?产生这种疑问是理所当然的。

以下在第一节的(一)中,将一边探索从马共成立至日军进犯期间的马共路线,一边就马共逐渐强调支援中国的必要性、而不重视马来亚的解放斗争的过程进行探讨。第一节的(二)将考察当时的马共领导人是一些什么人物、领导人中有多少华侨?在第二节的(一)中,对在日本占领下进行了抗日战争的马共没能实现把抗日战争转化为马来亚解放战争的原因,以及是否真要进行这一转化加以探讨。在第二节的(二)中,将调查日军侵占时期的华侨抗日组织到底是什么?以及马共对它们的成立如何起到主导作用?进而探索人民抗日军创建以来的轨迹,考察马共势力在日军投降时有多大规模。在第二节的(三)中,为了清楚地表明抗战期间马共与中国的关系,从3个侧面对出现于实际行动的抗日军的性质进行分析。3个侧面是与“祖国”中国关系的密切程度——中国性、与中共关系的密切程度——中共性、马来亚重视华侨的姿态——华侨性。第二节的(四)是第一节(二)的延续,主要就莱特的背叛行为及其牺牲者进行详尽论述。第二节的(五)根据日本方面的资料对第二节的(二)进行补充。

此外,本章将中国籍居民作为“华侨”,但未必是“临时居住(居住

① OBalance, Edgar, *Malaya: The Communist Insurgent War, 1948 - 1960*, London, Faber & Faber Ltd., 1966, p. 30.

② 筒井千寻:《南方军政论》,日本广播出版协会,1944年,第149页。

在马来亚的中国公民)”，而是指“华裔马来亚人”、即现在所说的“华人”。“华人”不作为一般名称使用，是因为当时这个词还没有被普遍使用。

## 第一节 战前的马来亚共产党

### (一) 路线、斗争形态

这里拟以中国、华侨、马来亚人问题为中心，考察一下马共的构成、纲领、决议、路线的变化。

#### (1) 南洋共产党

根据杨进发(C. F. Yong)的论述，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在英国治安当局的报告中出现是从20世纪10年代开始的，运动的创始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中国来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他们主要通过吉隆坡发行的国民党(马来亚支部)左派华文报纸《益群报》，劝说人们排除所有强权、支持绝对自由平等的无政府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及苏联，同时呼吁人们参加反对将山东省的德国权益让给日本、抵制日货、反对军阀等中国解放运动。1919年，“马来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Malayan Anarchist Federation)成立，1925年会员约为50人。1925年之前，正面进行反英的暴力事件仅发生过1起，至1925年参加者大部分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sup>①</sup>

根据谢文庆最近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初期至30年代后半期，斯尼弗利特(Hendrichus Sneevliet)、达尔梭诺(Raden Darsono)、阿利敏(Mas Alimin Prawirodirjo)、慕梭(Moeso)、丹·马拉卡(Tan Malaka)、苏丹·朱纳因(Sutan Djenain)等印尼共产党领导人逃避印尼国内的镇压，或受共产党情报局的指令，接二连三地进入马来亚，在马来人之间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活动。但是，正如丹·马拉卡1925年在给同志的

<sup>①</sup> Yong, C. F., *Chinese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Colonial Singapor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2, p. 203 - 208.

书信中写道，“马来人很保守，没有接受运动的余地。只有在华侨和印度人之间推广”，其目的并没有轻易地得以实现。他们大部分人在短时间内就遭到逮捕并被驱逐出境<sup>①</sup>。

1926年初，国民党（马来亚支部）左派成立了“南洋华侨各公团联合会”（Nanyang Public Bodies Union），该组织被英国当局警戒为“马来亚最初的共产组织”。其主要目的是进行孙文逝世（1925年3月）1周年纪念活动和反外国反资本主义运动。该联合会的领导是由13人组成的临时委员会，全部都是海南人（来自海南岛）。联合会不久便被迫解散，2年内临时委员有一半被捕<sup>②</sup>。

1926年5月，同样以海南人为中心组成了“南洋总工会”。到了1927年4月，该工会在马来亚、印尼、泰国、沙捞越已拥有42个支部，工会会员达5000-6000人，其大部分是海南人。而且据说一开始就处于中国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系统）的全面指挥下。1926年，仍然以海南人为中心成立了“南洋共产主义青年团”<sup>③</sup>。顺便提一下，中国的共青团于1925年1月26日改称为“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7年3月在新加坡举行的孙文逝世纪念日集会上，左派高喊着反英反帝口号游行示威，与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这个事件和中国国内的国共分裂（4月）引致了马来亚国民党分裂——脱离左派，组成“南洋共产党”。<sup>④</sup> 1928年1月以中共1927年1月至1928年初派遣的5名党员为中心成立了南洋共产党<sup>⑤</sup>（关于这些领导人，将在后文叙述）。同年，接受共产国际1927年的指令，组成了“反帝大同盟”（Anti

① Cheah Boon Kheng, *From PKI to the Comintern, 1924 - 1941: The Apprenticeship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1992, p. 6 - 17, 47 - 54.

② Yong, 前揭书, 第212, 213页。

③ 同上, 第215, 216页。

④ 同上, 第217, 218页。

⑤ Yong, C. F., 'Leadership of a Radical Political Movement - the Nanyang Provisional Committee (南洋临委), 1928 - 193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21 - 23 Jan, 1994, Singapore, p. 1 - 3.

战后不久的马来亚共产党的文件《马共言论之一：南岛之春》（新加坡、马来亚出版社，1946年）（以下简称“《南岛之春》”）认为南洋共产党是在1927年成立的。另外，根据该书，马共前身共产国际支部于1925年、“南洋部委”于1926年成立（第8页）。

- Imperialist League)。南洋共产党为了在马来人之间扩大影响力,在该组织内设置了马来部门,由阿利明、慕梭等领导。阿里(Ali Majid)等许多马来人加入了该组织,1929年阿里等3名马来人干部与南洋共产党的3名华侨领导人一起出席了“泛太平洋工会会议”(Pan - Pacific Trade Union Conference)(在上海召开)<sup>①</sup>。此外,根据英国治安当局的文件,“南洋共产党筹备委员会”中至少有5名马来人。但是,这些马来人领导人在1930年之前大部分被捕<sup>②</sup>。这时,对华侨共产主义者的取缔更加严厉,据说1928 - 1931年每年平均有1528人(马来亚国内的拘留者除外)被驱逐出境。好像对此加以补充似的,以海南人为主的许多中共党员又来到马来亚。后述的傅大庆(Fu Tai Keng)也是其中1人<sup>③</sup>。

南洋共产党向马来人扩大势力的愿望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成果,不仅大部分党员是亲中国的华侨,党本身也处于中国的领导下。据说,共产国际对这种事态表示担忧,决定解散该党并组成共产国际直辖的马来亚共产党(几乎同时也组成印度支那共产党)<sup>④</sup>。

## (2) 马来亚共产党

根据杨进发的论述,1930年4月中旬在森美兰州瓜拉比拉(Kuala Pilah)或柔佛州武洛加色(Buloh Kesap)召开的南洋共产党第3次代表会议成为了马来亚共产党成立大会。不仅马来亚,印尼、泰国、缅甸的代表也出席了大会,但由于马来人的主要领导人全部被捕,因此一个也没能参加。据说代表共产国际出席会议的胡志明一方面允许华侨领导马共,另一方面要求华侨领导人学习马来语等,以加深对马来人的理解,加强对马来人的影响<sup>⑤</sup>。

① Cheah, 前揭书,第10、132页;Yong, 前揭书,第223 - 225页;Yong, 前揭论文,第6 - 7页。

根据原马共干部张明今所言,“反帝大同盟”是马共的秘密群众组织、各民族反帝统一战线组织,设立了秘书处、宣传部、组织部,领导了文联、学联、红色工会等团体(1993年3月28日张氏给笔者的信)。

② Yong, 前揭书,第223、224、245页;Cheah, 前揭书,第16、51、132页。

③ Yong, 前揭书,第9 - 11页。

④ Yong, 前揭书,第235、236页;Cheah, 前揭书,第15、16页。

⑤ Yong, 前揭书,第233 - 237页。

前述的《南岛之春》认为“系在南洋共产党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决定”(第8页)。

但是,根据谢文庆发现的英国治安当局文件<sup>①</sup>,从会议记录可以确认有5名马来人出席了该会议<sup>②</sup>。

杨进发根据对当时的有关人员的采访、成立大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大部分于4月29日被捕的事实(根据英国当局的记录。这一同时逮捕被称为“那森路事件” < Nassim Road Incident > ),主张马共是“4月中旬”成立的,但马共本身将1930年4月30日作为建党日。而且,“马来亚革命之声”为纪念马共建党45周年于1975年6月发表的“马来亚共产党简史”认为建党大会在瓜拉比拉召开<sup>③</sup>。如果“4月中旬”是事实,为什么马共有必要说是4月30日?这是一个迷。根据原马共干部张明今(Chang Ming Ching)所言,4月20日前后在武洛加色的会议上决定建党,并于5月1日的国际劳动节公布“4月30日正式成立”(1996年7月31日张氏给笔者的书信)。

另外,台湾的张虎认为第3次代表大会的场所是在新加坡,并说召开日是4月27日或4月30日<sup>④</sup>。

同年5月,南洋总工会改组为“马来亚总工会”;9月,南洋共产主义青年团改组为“马来亚共产主义青年团”。期就其势力来看,1930年马共党员为500人,1931年约达1500人,总工会会员1930年达到10000-15000人,1931年约为10000人<sup>⑤</sup>(共青团员人数不祥)。

马共一直致力于获得马来人的支持,尤其是在林茂(Rembau,森美兰州)、瓜拉比拉等,有许多马来人加入了该党的农民组织——“农民同盟”(Peasants' Union)。1931年瓜拉比拉5名地区委员全是马来人。1932年5月,以7名马来籍干部(其中4人是印尼人)为中心,计划成立仅有马来人的政党“全马来党”(All-Malay Party)。由于干部

① Public Record Office File, C. O. 537/3752. 'Malay and Indonesian Communists: Supplement No. 5 of 1948 to Malayan Security Service', Political Intelligence Journal, No11/48, 15 Jun, 1948.

② Cheah, 前揭书,第132页。5人的名字如下所示。

Ahmad Baikai b. Suib, Salleh b. Sapi, Jamaluddin, Emat @ Abdul Hamid, Hj. Mahmud b. Hashim.

③ “马来亚共产党简史”, 亚洲经济研究所《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重要声明集》, 1975年, 第2页。(以下简称《重要声明集》)。

④ 张虎:《早期马共历史之分析研究》, 台北, 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80年, 第8, 29, 33页。

⑤ Yong, 前揭书, 第234, 246, 247页。